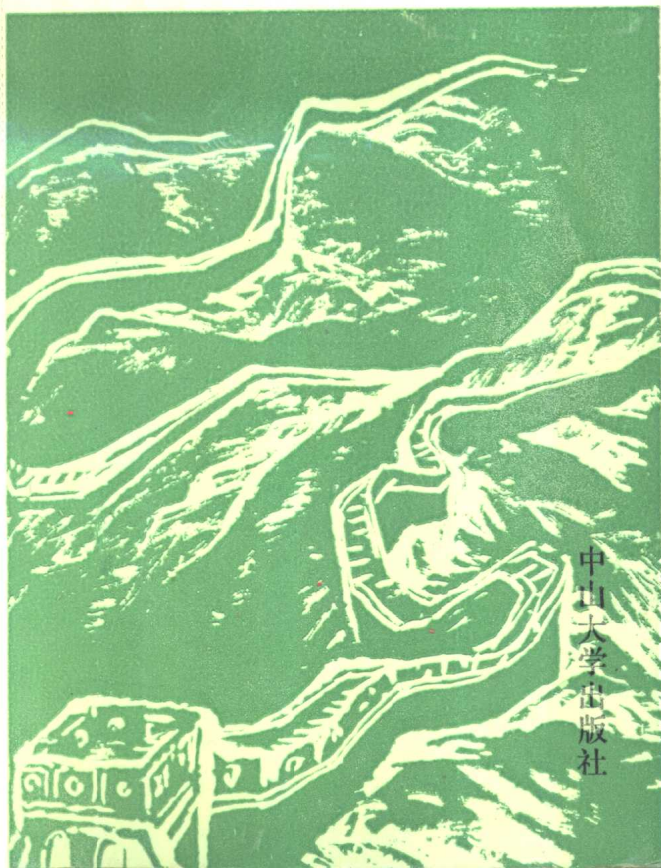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系列

孙中山廖仲恺 与中国革命

〔美〕陈福霖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廖仲恺 与中国革命

[美] 陈福霖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

(美) 陈福霖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印刷厂印刷

160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7万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306-00302-X

K·39 定价：7.80元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系列

〔美〕陈福霖著

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

趙樸初題





孙中山像



廖仲愷像



孙中山与廖仲恺

序 言

要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今天，就必须很好地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研究近代中国，孙中山研究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孙中山活了不足59年，但他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对中华民族来说，那是一个几千年来最屈辱、最痛苦的年代，又是一个为自身的振兴进行极为艰苦的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年代。孙中山的一生，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当时的追求、探索、希望和奋斗。孙中山的英名，鼓舞、激励了不止一代人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斗争。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提高，人们对孙中山尊崇与怀念之情也与日俱增。我敢肯定，在若干世代以后，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决不会忘记孙中山。孙中山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了学习历史遗产的号召，说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用孔夫子、孙中山概括在他以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确实十分精辟。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孔夫子和孙中山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影响最为巨大的两位历史人物。毛泽东这番话在50年后的今天，仍能给人以很深的启发。研究孙中山，不仅是研究百余年近代中国历史的需要，而且是研究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需要。因此，在今日的中国，研究历史人物的论著，相信是以有关孙中山的数量为最多。在国外，无论是日本、苏联（还有东欧各国）还是西方国家，孙中山研究都是汉学界很重视的课题。这正是孙中山本身的历史地位决定

的。

孙中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地创造历史。他有他的群众基础，也有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在他的同志和战友中，廖仲恺是特别重要的一位。孙中山是革命领袖，廖仲恺是他得力的高级助手。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对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特别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他们以非凡的远见与博大的胸怀，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热情地实行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今天，全世界的华人，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不管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对孙中山、廖仲恺怀有敬仰之情。陈福霖先生说：“在心理上，我对这些革命家的尊崇和敬慕，倒是前后一致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孙中山和廖仲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高尚人格。中华民族对历史人物历来注重道德评价。孙中山和廖仲恺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革命，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眼界宽广，谦虚好学，仁慈宽厚，他们的廉洁奉公更是连他们的反对者也不能不钦佩的。我想，这也是孙中山与廖仲恺得到广泛尊崇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孙、廖两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思想、活动都有很多共同点，把两个人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因而，我得知陈福霖教授的《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一书将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消息后，感到十分高兴。陈教授要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也感到十分荣幸。

陈福霖教授是我国研究孙中山的学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美籍华裔学者。他是西方学者中研究廖仲恺特别有成就的一位，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他早年在香港就学于罗香林教授门下，在美国又得到韦慕庭（C. M. Wilbur）教授的指导，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西方的研究方法都有所师承，开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虽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都有朋友。在这本书中他就谈到在研究廖仲恺时，

在大陆得到廖承志同志的关心、支持，在台湾又得到黄季陆先生的支持、协助。陈福霖教授有机会接触和利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外国的各种资料、文献，这就使他的研究更为扎实。

这几年，陈教授常来中国大陆，他又是中山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与中山大学的同事曾多次与陈教授共同讨论有关研究孙中山、廖仲恺的学术问题，但因时间关系，彼此都常有言犹未尽之感。这次《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的出版，使我们有机会对陈福霖教授所研究的课题与主要论点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有幸作为书稿最早的读者之一，在这里，想谈一下对这本书的一些不甚系统的体会。

陈教授是一位在外国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他的研究，无论在课题、方法、论点和资料方面，都带给我们一些新东西。他关于孙中山、廖仲恺20年代的一些活动的论述，利用了不少台湾、香港、英国、美国的档案及中西文报刊资料，谈了一些我们以往没有注意到或不知道的东西。这就使我们对孙中山、廖仲恺后期的思想与活动有更多的了解。

陈教授有机会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有机会对廖仲恺的亲属和同事直接采访。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对所有的资料都进行审慎的分析考证。即使对一些从来源看似乎是很有权威性的史料，陈教授也持非常谨严的态度。正是因为这种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一些论点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承认作者的研究是严肃认真的。陈教授的一些考订，还纠正了我们以往一些不甚确切的看法。

这本书的各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它的好处是不拘一格，可以使读者了解作者在不同问题上的论点。但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全书的系统性；个别论点，前后也稍有差异。我想作者是有意保留这一点的，以便体现研究的深化。这也反映了一位学者求实的不掩饰的精神。

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陈福霖教授当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例如,本书谈到,苏联在1923年5月曾打电报给孙中山,“然而未能找到史料证明孙中山收到这份电报。”(第一编第5章注43)陈教授依据的是韦慕庭教授70年代收集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但苏联方面近年公布了几件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往返的函电(《远东问题》1987年第1期),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找到了史料证明。我举这个例,无非是想说明,在研究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新资料。学术没有国界。陈教授的研究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和新资料的发现也会补充陈教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相信,陈教授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同行们的兴趣,在促进孙中山、廖仲恺研究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陈锡祺

1990年2月于康乐园

自序

孙中山和廖仲恺是两位杰出的革命家，他俩又是相交22年，饱经患难的亲密战友。在他俩的晚年，孙中山和廖仲恺努力促进国共合作，以求国家统一。这种爱国爱民的精神，实在是中国民族主义最高理想的表征。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从事研究这两位优秀革命家的功业。这本书所收集的17篇文章，可以算是一部分的成果。最近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胡守为教授的鼓励，把这些论文修改增订，交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刊印成书。现在谨借这个机会，向胡守为兄表达衷诚的谢意。

除了“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廖仲恺和孙中山”二文尚未曾出版过之外，其他的15篇文章均已先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各地出版。最早刊印的是“廖仲恺（1878—1925）——一个中国革命家”。该文于1971年收录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第35至60页。最迟出版的是“研究孙中山的几个历史问题——兼评黄宇和教授有关伦敦蒙难的新著”。这篇论文在1989年6月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9卷，第1期，第229至241页。

在这17篇文章中，10篇本来就是用中文撰写的。此外，“孙中山与香港，1923年1月—6月”的英文原稿，先在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的《近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3卷，第1期（1979年2月）刊载，后来由曾学白翻译为中文，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出版。“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起源”的英文稿，早

在1976年已收入我和艾索(Thomao H. Etzold)合编的《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China in the 1920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一书里，后来由甘德星翻译，刊登于张玉法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廖仲恺与1924—1925年广东的劳工运动”的英文原稿，先登载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81年)，第433至455页，经江枫翻译后，再刊印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266至286页。“1905—1925年廖仲恺与中国革命的领导”的英文稿，在1982年刊载于陈炳良编的《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翻译为中文，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第3期(1983年)出版。这四篇译文，这次都经过我修改和校订，才收录在《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一书之内。

“从反清到反帝：孙中山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阐释”和“孙中山与革命同盟：1903年—1907年和1922年—1925年之比较研究”两文的中文译稿，最初是由我在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的学生叶妙娜提交的。另外的一篇：“研究孙中山的几个历史问题——兼评黄宇和教授有关伦敦蒙难的新著”，则由现在迈大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令湖萍翻译。这三篇译文，均经我严格地审核、修改和校订之后，才收入《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这本书里。它们都未曾在其它刊物发表过。

此外，“撰写《廖仲恺年谱》引用的重要史料”一文，早已于1972年12月在台北的《传记文学》刊登过。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各地的史学界又出版(或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因此，我便把这篇旧文章重新改写一次。结果，现在收录为这本书的一章，和它的本来面目，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可以算是一篇新的著作。另外，我在“评述有关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重要著作”一文

里，亦添增了许多新的资料。我采取这种严谨的态度，主要是希望没有辜负胡守为副校长和各位师友多年的厚爱。

不过，我用的中文词句，和各位翻译者的文体与风格，颇有差异的地方。因此，在这本书的各章里，便难有“一气呵成”的效果。更重要的，这17篇文章出版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对孙中山和廖仲恺的评价，总有不少的改变。所以，近年撰写的文章，如“研究孙中山的几个历史问题——兼评黄宇和教授有关伦敦蒙难的新著”，“廖仲恺的家世及早期事迹”，“廖仲恺和孙中山”和“廖仲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等，和早期发表的论文，在评论上便有明显的分别。例如，在“廖仲恺（1878—1925）——一个中国革命家”和“廖仲恺与1924—1925年广东的劳工运动”两文里，我接受了何香凝和廖梦醒的记载，坚称廖仲恺因为对叔父家里的“腐败生活方式”很感不满，才决心到日本留学，“藉机和一些有志之士交往”。但是，在后期出版的文章里，我对这种过分简单化的结论，持有怀疑的态度，反而强调廖仲恺在辛亥革命前，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两种不同途径的心境。在这本书里，我保留了这类前后不相符的言论，希望藉此反映出我在二十年内，在各种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的研究心得。进一步来说，这些不同的论调，也代表了我在二十年间的理性历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复杂和困难，因此在研究上比较着重革命家所遭遇到的挫折和阻挠。在心理上，我对这些革命家的尊崇和敬慕，倒是前后一致的。

我在香港和美国求学期间，曾受到了两位恩师的教导。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韦慕庭（C. Martin Willur）教授，均是研究孙中山历史的权威学者。在这两位业师诱导之下，我在60年代便开始对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感到兴趣。从1982年开始，我又认识了中山大学历史

系的陈锡祺教授。在中国史学界里，他是研究孙中山最有成就的专家。多年来他对我孜孜不倦的指导和鼓励，这种扶掖后辈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的模范。我虽然未曾在陈教授门下受业，却有幸能有机会对陈教授执弟子之礼。他更抽空为我这本书写序，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我对这三位老师的谢忱，又岂是笔墨所能表达的呢？

在60年代的后期，我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的史库搜集有关廖仲恺的史料时，得到黄季陆主任委员的鼎力支持和协助。1982年6月16日，我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主任厚意款待，他还花了近五小时的宝贵时间，向我追忆他的父亲的革命功业。1984年2月，他的长子廖晖主任邀请我到中国从事研究廖仲恺的历史，在他的安排之下，我还访问了邓颖超和廖梦醒两位女士。此后，我每次到北京时，都有机会和廖晖主任详谈。1987年6月，当他知道我出版这本书的计划以后，便代我请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题字。多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首长对我爱护和鼓励，实在使我终生铭感。我对赵朴初先生的错爱，更是感激。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除了上述的老师和政治首长之外，我还得到了许多老朋友的指导和帮忙。这些专家的宝贵意见，帮助了我改正文章上不少的错漏。我特别感谢下列的各位师友：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教授，邓嗣禹教授，唐德刚教授，余秉权教授，薛君度教授，实藤惠秀教授，李新教授，金冲及教授，章开沅教授，蒋永敬教授，李云汉教授，山田辰雄教授，张朋园教授，张玉法教授，赵令扬教授，伦霓霞教授，吴应铤教授，张磊教授，姜义华教授，黄彦教授，段云章教授，余炎光教授，叶嘉炽教授，林家驹教授，莫济杰教授，尚明轩教授，桑兵教授，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陈占勤会长，和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蒙光励馆长等。

我和现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吴书剑先生的友情，是从1984年开始的。在这几年内，他对我到中国搜集史料，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便利。我谨借这个机会，向他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最后，在这几个月里，迈大的中国留学生胡晖，李力，程耀明，陈楚楚，令湖萍和周令仪等，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替我誊抄书稿，使我能够准时交给中山大学出版社刊印，我对他们的好意和热情，真是万分的感谢。当然，这本书的一切错漏，还是由我个人负责。希望史学界的前辈和朋友，今后多给我一些珍贵的意见，使我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的进步。



作者简介

陈福霖，美籍华人，1938年出生于香港，现为美国迈阿密大学中国史教授。并任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会长、加拿大民族主义研究评论编辑委员、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校外考试委员、（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其著作甚丰，曾在美、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含大陆和港台）等地出版。主要论著有：《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中国的对外关系》、《东亚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政治》、《中国统一和台湾问题》等。

2000.01